

一、共青團推動青年「下鄉」之觀察

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包淳亮主稿

- 共青團印發「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」，其中「文化、科技、衛生三下鄉」以大學生社團活動為基礎，不是文革時期「上山下鄉運動」再現。
- 農村現代化解決三農問題，減少城鄉差距亦是「三下鄉」的目標。
- 習近平批共青團殭屍化，共青團面臨改革壓力，企藉推動青年「三下鄉」扭轉形象。

（一）前言

2019年4月，中共共青團中央印發「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」，「明確以培育本土人才興鄉、服務在外人才返鄉、動員社會人才下鄉作為重要著力點，大力培養、凝聚、舉薦一批在鄉村大施所能、大展才華、大顯身手的青年人才，組織動員廣大青年接續奮鬥、服務鄉村振興戰略」。由於提到「下鄉」，引起其是否為文革時期「上山下鄉」翻版的疑慮。本文首先就該意見進行探討，其次是此「意見」的推出背景，然後略論中共「鄉村振興戰略」的目標，最後再回到共青團，分析共青團希望在此戰略中發揮的作用。

（二）共青團的「三下鄉」

前述「意見」計劃「到2022年，力爭組織超過1000萬人次大中專學生，參與大中專學生志願者暑期文化、科技、衛生『三下鄉』社會實踐活動。」這個計畫，讓一些報導誤稱其將讓「千萬青年下鄉」，但其實一千萬「人次」並非一千萬「人」，「文化、科技、衛生三下鄉」活動也不是「上山下鄉運動」。

就中共官方的論點，青年「三下鄉」，是要讓「現代化生產方式、生活方式和相關知識」下鄉，目標是「農業與農村的現代化」和「城鄉一體化」。早在1980年代，共青團就已開始在暑期開展大學生「三下鄉」的「社會實踐活動」，這個作法基本上延續到現在。與文革時期「下鄉」的時間長達數年不同，每次「三下鄉」活動的時間都不到

一個月。而目前大陸在校大學生已接近三千萬人，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大學生參與該活動，就幾乎可以達到三年內一千萬人次的目標。

共青團的「三下乡」其實是以大學的社團活動為基礎，例如上海財經大學的「走千村，訪萬戶，讀中國」的「千村調查」暑期社會實踐活動，廣東中山大學旅遊學院的「阿者科計劃」。共青團還提出「西部計劃志願者」、「研究生支教團」等長期志願服務計劃，入選的研究生要到貧困地區的中小學擔任一年的教師。與許多臺灣的大學服務性社團的參加者類似，這類活動逐漸被當代大陸的大學生視為自我成長的機會（曹東勃，「國家將動員 1000 萬青年下鄉？自媒體又帶節奏」。觀察者網，2019. 4. 10）。

（三）城鄉差距的客觀現實

「三下乡」的目標，「農業與農村的現代化」和「城鄉一體化」。這個目標的提出，是因中國大陸的城鄉差距是長期存在的現象，但在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前，人們被戶口制度拘束在自己的單位，不容易對此有所感知。改革開放後，東南沿海與主要城市發展較快，加上人員流動頻繁、訊息更為開放，使得人們更容易感受到地區與城鄉之間的差距。

不過到 2010 年代中後期，許多學者指出中國大陸已邁過「劉易斯拐點」，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不再大量富餘，並導致中下層勞動力的薪資快速上漲。與此同時，城市消費進入高原期。隨著中國大陸逐漸逼近「已開發國家」的門檻，進一步提升中、小型城市、農村的生產力與消費力，已成為避開「中等收入陷阱」、擴展中國內需市場的主要方向。在此背景下，逐漸「拉平」中國城鄉之間的教育、醫療、養老等的差距，已是「改革開放」下一步的突破重點，而這也就成為前述「意見」所稱「大施所能、大展才華、大顯身手」的背景。

（四）中共當前的「鄉村振興戰略」

前述的時代背景，意謂著當前中國的「農村問題」，已經與過往有所不同。過去的中國農村被視為是「一窮二白」。前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、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1965 年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曾提出「社會主義新農村」概念，目標僅是在農村實現「水利化、化學化、電氣

化和機械化」，並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，而這些目標都基本已經實現。

大約 1990 年代後期、2000 年代，農村面臨的困境，已經轉變成在快速現代化的背景下，「人口流失和生活方式轉變正在使鄉土文化趨於解體。一些具有百年歷史的古村莊人去屋空，流傳千百年的民俗、手藝瀕臨失傳，縣志、村志等鄉土文獻整理無人問津，鄉村文化設施老舊短缺，賭博迷信等不良風氣抬頭」(人民日報)。無怪乎 2006 年中國大陸「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」，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的要求是「生產發展、生活寬裕、鄉風文明、村容整潔、管理民主」。

而到 2017 年 10 月 18 日，習近平在中共「十九大」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，雖然依舊聲稱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『三農』問題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」。但如前所述，其目標已經與過往不同，且手段也已大有不同。例如江蘇共青團啟動「新農菁英」培育發展計劃，廣東共青團構建「領頭雁」，浙江共青團開展「家燕歸巢」活動，湖南共青團開展「引老鄉、回故鄉、建家鄉」返鄉青年創業就業推進會，陝西共青團實施「萬村萬人」青年電子商務人才培養計劃等(「團中央部署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點擊」。中國青年網，2019.4.12)。在相關介紹中，可以看到「鄉村振興戰略」希望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，拓寬增收渠道」，培養一支「懂農業、愛農村、愛農民的『三農』工作隊伍」，「保障農民財產權益，壯大集體經濟」，「通過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……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。」

中國大陸希望藉由引進新興產業、發展電子商務等內容，以「非農業」帶動「農村」發展、並提升農民生活水準的舉措。雖然農村相對於城市，在就業、就學、就醫三方面，都將長期處於弱勢，但在城市房價「高處不勝寒」的情況下，藉由持續以基礎建設提升農村生活品質，輔以輿論重新塑造民眾對農村生活的想像，包括提供一些「下鄉」青年可用以「肯定自我」的相關論述，或許有機會強化中共對農村的掌控，提升農村經濟活力，乃至於有助於在農村維持人口替代、緩解少子化與老齡化危機。

（五）共青團「主動請纓」的背後

面對始終存在的三農問題，共青團「主動請纓」，推動青年下鄉，則或許是其面對組織存續壓力的不得不然。2016年8月3日「紐約時報」報導稱，許多通過共青團晉升的官員，已在習近平時代被邊緣化。當時中共提出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，縮減共青團中央的領導層，加強黨對共青團的控制，並讓其重返基層，為爭取中國的年輕人而努力。此前由於脫離群眾，未起到其本該在年輕人中啟發理想主義的作用，當時媒體人李大同批評稱：「共青團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殭屍」（儲百亮，「習近平為何要整頓共青團」。紐約時報中文網，2016.8.4）。

「紐約時報」報導稱，宣布共青團改革方案的幾個月前，中共紀委就「發佈一份相當長的、指出包括共青團領導人高高在上等問題的、措辭異常嚴厲的意見」，要求團中央領導「積極消除『貴族化』傾向」。「多維新聞」甚至在2017年6月5日的報導指出，習近平批評共青團「空喊口號」、「形同虛設」、「四肢麻痺」、「說科技說不上、說文藝說不通、說工作說不來、說生活說不對路。說來說去就是那幾句官話、老話、套話，同廣大青年沒有共同語言、沒有共同愛好，那當然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」，「隨後，時任共青團第一書記秦宜智於2017年9月轉任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，並落選中共「十九大」代表……仕途明顯受挫」。此後共青團第一書記懸缺多時，到了隔年6月，才由賀軍科接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。

在共青團人事大整頓的背景下，該單位的組織目標，反而變得更加具有臺灣戒嚴時期「救國團」的色彩。「三下鄉」的內涵，也與一些臺灣的大學裡面的「服務性社團」顯得愈來愈類似。此外，當前中國大陸的國家領導人如習近平與王岐山，都將他們的「下鄉」經驗當成鍛鍊自己的機會；將此刻的「三下鄉」與文革的「下鄉」混淆，在中國大陸境內也未必會引起太多漣漪。